

丁未皖案与清末政局^{*}

安东强 姜 帆

摘 要：1907 年的丁未皖案是一个突发事件，却推动了清末政局的进程：在权力高层，既影响到丁未政潮的政治走向，间接促使清政府决意设资政院和筹办谘议局；在朝野舆论，将满汉关系、革命党等问题推向舆论焦点；在长江中下游巡防设置上，清政府改变了此前的长江防务格局，试图抵制革命势力的发展，引发了清政府与沿江督抚的博弈。从整体上把握清政府、革命党及其他政治势力的相互角力与影响，可以细致深入地展现清末革命与改革之间“互动”影响的史实联系。

关键词：徐锡麟 丁未政潮 革命党 长江防务

丁未皖案，即 1907 年 7 月 6 日（光绪三十三年五月二十六日）安徽巡抚恩铭被巡警学堂总办、光复会成员徐锡麟击毙一案。此案在辛亥革命史的历史脉络中具有重要地位与意义，也称为“安庆起义”或“浙皖起义”，与同盟会领导的历次起义活动互为声援，极大地冲击了清朝的统治秩序。既往研究已对徐锡麟的革命思想、活动进行了详细考察。^① 本文试图转换视角，以清政府的档案资料为基础，与当时的各方舆论相互比勘印证，深入而细致地考察清政府及国内外各方政治力量对丁未皖案的态度和反应，就此案对辛亥革命、清末政局的影响作进一步探讨，希望对于深化辛亥革命史研究提供新的视野和思路。^②

一、清政府高层的反应

安徽巡抚恩铭是满洲镶白旗人、清末新政的积极推动者，他对趋新的知识界也颇为欣赏。由于恩铭身份的重要性，他被革命党击毙一案为清末政局走向增添了某种变数。在革命党看来，

* 感谢匿名审稿人的意见和建议，谨致谢忱。

① 最具代表性的论述，当属章开沅、林增平主编的《辛亥革命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年）与金冲及、胡绳武合著的《辛亥革命史稿》（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 年、1985 年、1991 年）等著作对该事件的论述与评价。

② 关于徐锡麟一案引发的化除满汉畛域问题的讨论，迟云飞《清末最后十年的平满汉畛域问题》（《近代史研究》2001 年第 5 期）与李细珠《清末预备立宪时期的平满汉畛域思想与满汉政策的新变化——以光绪三十三年之满汉问题奏议为中心的探讨》（《民族研究》2011 年第 3 期）两文已有详细讨论。

恩铭被徐锡麟击毙，固然是革命活动的重要成就，而徐锡麟及随之被逮捕的秋瑾均遭杀害（时称“皖案”、“浙案”），又为革命党的反清舆论增添了新的内容。不过，在清政府高层看来，满人巡抚被击毙具有更多的政治意味，遂成为影响清末政局变革的一个重要突发因素。

1907年3月，主管外务部事务的庆亲王奕劻利用外交手段将孙中山“驱逐”出日本，以此打击留日革命党。然而，不到4个月，广东接连暴发革命党的举事，安徽更是爆发丁未皖案。这在视徐锡麟与孙中山等革命党为一体的奕劻看来，无疑是革命党的“报复”活动。“报复”之说尽管未必符合徐锡麟举事的本意，但专就“报复”恩铭而言却是当时报章渲染此案的重要主题。据称，案发之前，恩铭接直隶总督袁世凯、两江总督端方电，传闻“孙文党羽在长江一带勾结匪徒，暗谋起事，沿江各埠务须严加防范”。恩铭接电后，密饬芜湖、沿江各营汛注意防范。^① 案发之后，时论以为革命党刺杀恩铭，“因孙汶密运军火来华，均由长江一带大通等处潜运”，恩铭分咨各省严查，“故该党怀恨甚深，有此报复”之举。^②

袁世凯既为奕劻驱逐孙中山出谋划策于前，又通电恩铭防范革命党于后，显然他也意识到报章所谓革命党“报复”之事。丁未皖案之后，袁世凯很快便接到端方急电，先是表示“骇极”，继又表示“痛悼”，称“昨得日本探报，乱党因揭竿无成，现会议专定暗杀之议。徐锡麟或逆党耶？”^③ 另据盛宣怀在北京的坐探称，袁世凯“闻皖抚事，几为之悸，于是而病”，甚至上折请病假。^④ 丁未皖案次日，袁世凯上折称因患病渐深，难以速愈，请赏假一个月。后获谕旨：“该督向来办事认真，兹据因病请假，殊深廑念。著赏假一个月，安心调理。”^⑤

据盛宣怀的坐探称：慈禧获闻恩铭被击毙，“痛哭，从此心灰意懒，得乐且乐”，同时谕令庆亲王“亦宜节劳”，^⑥ 她还密令直隶、湖北举荐良医，“枢廷谆嘱秘密，当不肯令各省同举”，其身体状况“无大恙，只饮食失调，久坐思倦，然起居散步均如常”。^⑦ 对于恩铭的身后事，慈禧给予极大哀荣。上谕以“忠勤廉介，克尽厥职”八字，对恩铭在安徽巡抚任内的作为盖棺论定，并称“此次因公仓卒被害，深堪悯恻，著加恩予谥，照总督阵亡例从优议恤”，且令恩铭之子山西候补道咸麟以道员即补。^⑧ 饰终之典，可谓厚矣。不久，咸麟扶柩北上回旗，有军界中人制送了万民牌伞及祭轴、挽联等物，但教育界人士“无一束之刍”。^⑨ 朝野各方态度差异，表明以学界为代表的新知识界对于官方表彰恩铭的举措不以为然，甚至对恩铭本人的作为也有所保留，故而未趋从官方的做法。

对清政府而言，料理恩铭身后事还包括新任安徽巡抚的人事任命。这对于奕劻和袁世凯来说，也是一个政治上党同伐异的良机。他们遂利用满人巡抚被革命党击毙的政治氛围，围绕安徽巡抚一缺人选大做文章，试图削弱政治对手。丁未皖案发生之时，正值丁未政潮的重要阶段：

① 《皖抚慎重江防（芜湖）》，《申报》1907年6月25日，第10版。

② 《电二（安庆）》，《申报》1907年7月8日，第4版。

③ 《致两江总督端方电》，骆宝善、刘路生主编：《袁世凯全集》第16卷，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266、271页。

④ 陈旭麓、顾廷龙、汪熙主编：《辛亥革命前后：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一》，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57页。

⑤ 《因病请赏假调理折》，骆宝善、刘路生主编：《袁世凯全集》第16卷，第268—269页。

⑥ 陈旭麓、顾廷龙、汪熙主编：《辛亥革命前后：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一》，第57页。

⑦ 《致湖广总督张之洞电》，骆宝善、刘路生主编：《袁世凯全集》第16卷，第271页。

⑧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33册（光绪三十三年），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95页。

⑨ 《皖抚恩新帅被刺余闻》，《申报》1907年7月26日，第3版。

在此之前，瞿鸿禨、岑春煊试图扳倒奕劻、袁世凯，而奕劻、袁世凯等人则积极推动“去岑”与“倒瞿”之举，并欲进一步“陷岑”、“去林”（林绍年，时任军机大臣）。^① 安徽巡抚被击毙，固然令奕劻和袁世凯悲痛，但空出安徽巡抚一缺，这为其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政治机遇。当时官场传言由于徐锡麟一案后革命党的声势与影响日剧，清廷拟重新组织中枢人事，“风闻内外大臣有更调之说”。^②

具体而言，其一，丁未皖案后的安徽巡抚一缺，奕劻曾有意由军机大臣林绍年调补。据称，安徽布政使冯煦电奏至，举朝大骇，但奕劻在惊骇之中仍能乘机设计将林绍年从军机处挤出，“请出之，以代恩铭”，慈禧太后一度从之。后经军机大臣世续劝阻，“皖省事简，今乱首已获，遽出枢臣为巡抚，恐南人震惊，新党互相猜疑，激成大变。冯煦办贼尚好，以节钺授之，必无事”。慈禧遂“大悟”，^③ 于是安徽巡抚改由处理丁未皖案颇为得当的原安徽布政使冯煦升任。^④ 此说未必无凭，亦能从当事人的电文及后来史实中得以印证。不久，林绍年外放为河南巡抚。8月16日袁世凯电告端方，“赞（林绍年，字赞虞）早有出枢象，皖缺已议及”，在恽毓鼎参劾岑春煊时，“亦暗射赞，适有缺即放之”。^⑤ 这无疑是他们试图利用丁未皖案，改变中枢权力格局极有力的证据。

其二，奕劻自保成功。慈禧将瞿鸿禨开缺之后，曾意图将奕劻一并开缺，经军机大臣世续、鹿传霖劝阻，未成决议。^⑥ 在保留奕劻的同时，又令醇亲王载沣入军机，制衡奕劻。载沣深知此番枢垣人事变革的微妙，故奉旨入军机处的当日，即前往奕劻处拜谒。^⑦ 满人巡抚被革命党击毙，再次将满汉畛域推至舆论焦点。慈禧多次劝慰奕劻当此之时不必劳顿，又传言欲起用载振，种种迹象表明慈禧转向继续倚任满人亲贵。^⑧

其三，“陷岑”序幕随之拉开。在恩铭死后两日，慈禧还在为恩铭事“痛哭”之际，即有御史陈庆桂弹劾岑春煊。不久，又有恽毓鼎弹劾岑春煊与康有为、梁启超结交。岑春煊遂被慈禧弃用。事实上，就在袁世凯从端方来电中获知恩铭之死的同一天，他还在电催端方搜集岑春煊与康有为、梁启超密会的证据：“闻康梁十一抵沪，即晚密谒伊（即岑春煊）。三日内见数次。康梁寓狄楚青家，伊退休决于康梁，请设密确查。”^⑨ 庆袁一党借岑春煊与康有为、梁启超勾结的罪名将岑春煊扳倒。

就此而论，丁未皖案与新任安徽巡抚人选之争，在一定程度上间接影响了清政府高层政治斗争的走向，还对清末预备立宪与外官制的进程有所影响。1907年7月9日，袁世凯电告端方，“外官制因西林催诘，本将发表立宪诏，闻因皖案仓卒为之，用邸主持，恐无真补救意也”，所

① 郭卫东：《论丁未政潮》，《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5期。

② 孙宝瑄：《忘山庐日记》下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1057页。

③ 胡思敬：《国闻备乘》卷2，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78页。

④ 冯煦之后，朱家宝接任安徽巡抚。朱家宝“以附袁建节（由知县至开府不过数年）”，在安庆屡有革命党人举事之后，他“一无善后布置，祸犹未已也”。在恽毓鼎看来，朱家宝“无才略可言，恐误东南大局”。（恽毓鼎著，史晓风整理：《恽毓鼎澄斋日记》（2），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421页）

⑤ 《致两江总督端方电》，骆宝善、刘路生主编：《袁世凯全集》第16卷，第414页。

⑥ 胡思敬：《国闻备乘》卷4，第134—135页；陈旭麓、顾廷龙、汪熙主编：《辛亥革命前后：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一》，第60页。

⑦ 爱新觉罗·载沣：《醇亲王载沣日记》，北京：群众出版社，2014年，第250页。

⑧ 据称，慈禧太后还召见了被解职的载振（奕劻之子），“喜振机变敏捷，深知大体，日前拟赏其在御前大臣上行走”。奕劻却代为固辞。（《申报》1907年7月14日，第3版）

⑨ 《致两江总督端方电》，骆宝善、刘路生主编：《袁世凯全集》第16卷，第266页。

以“我辈正可应诏条陈，切实尽言，或小有小益”。^①后遂“密奏请赶紧实行预备立宪”的十条意见，并密告端方所拟诸条大纲，提出昭告立宪、早设责任内阁、设立资政院与实施地方自治等项措施。

袁世凯在密奏的“国信必须昭彰”一策中称拟请旨即京师速设资政院，以三个月为限组织成立，照原拟官制，选举京、外才智通达的官绅聚集其中，简派深明治体、素著声望的王大臣总其责成。又在“资政院必须设立”一策中称至于前拟资政院官制，即为采取舆论之地，迄今该院尚未设立，颇令臣民泄气。“立宪各国，无不有民选议院，纳聪明才智于一途，以代国民全体”，从而议院与政府相得益彰。前所拟资政院官制，因无从着手，暂拟为钦选、会推、保荐三类，现如今有关直省官制及各省谘议局、各府州县议事会的办法纷纷提出，则更加完备，“若各府州县举其议事之尤者以升于省谘议局，各省谘议局举其尤者以升于资政院，使全国舆论丝联绳贯，若纲在纲，采群言以作公言，资群力以厚国力，则气象必有大异于前者”；若复因不举，使天下臣民疑舆论之不复采用，立宪之遥遥无期，则不能收拾涣散之情而平靖纷纭之势。此策却又因奕劻、铁良暗阻，“十策无效”。^②

所谓“无效”之说，或为袁世凯的建议一时受挫。1907年9月初，载泽向慈禧、光绪面陈六事，首要二事即为“宣布实行预备立宪”和“设资政院于京师”。传闻“两宫颇为动容”。^③9月20日，清政府决定设立资政院，“立宪政体，取决公论，上下议院实为行政之本。中国上下议院一时未能成立，亟宜设资政院，以立议院基础”，并简派溥伦、孙家鼐为资政院总裁。10月19日，又饬各省筹设谘议局，作为“采取舆论之所，俾其指陈通省利弊，筹计地方治安，并为资政院储材之阶”，并预备设立各府州县议事会。^④

这显然采纳了袁世凯一派的主张，以资政院作为清政府准备实施立宪、收拾人心的举措。尽管保皇党认为清政府迫于丁未皖案等事，连下预备立宪、开资政院、平满汉等谕，“其出于敷衍，非真诚自不待言。然既定开资政院，则显授国民以可乘之隙，他日国会之成立在此，吾党之成立亦在此”。^⑤一时之间，国内趋新士人对清末预备立宪寄予希望，纷纷组织诸如各类自治社等立宪团体，保皇党也积极组织政闻社。

二、清政府的应对与国内政治风向

丁未皖案后徐锡麟被清政府抓捕，因其在口供中称“灭尽满人”，令满汉关系再度成为朝野关注的焦点。如何筹议化解之法，成为当时的敏感话题。

清政府很快得到徐锡麟的口供：“为排满事，蓄志十几年，为我汉人复仇，先杀恩铭，后杀端方、铁良、良弼等，灭尽满人为宗旨。”^⑥此后，达官贵人人人自危，清政府高层尤感恐惧，甚至将官员的引见礼废止，改为验放。^⑦其中最紧张的是曾被革命党列为刺杀目标的清廷要员，

① 《致两江总督端方电》，骆宝善、刘路生主编：《袁世凯全集》第16卷，第280页。

② 《致两江总督端方电》，骆宝善、刘路生主编：《袁世凯全集》第16卷，第334—342、387页。

③ 《泽公面陈六事》，《汉文台湾日日新报》1907年9月8日，第1版。

④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33册（光绪三十三年），第192、219页。

⑤ 《徐勤致康有为书（1907年冬）》，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编：《康有为与保皇会》，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381页。

⑥ 《致东三省总督徐世昌奉天巡抚唐绍仪电》，骆宝善、刘路生主编：《袁世凯全集》第16卷，第275页。

⑦ 孙宝瑄：《忘山庐日记》下册，第1050页。

如陆军部大臣铁良，此前在《民报》增刊《天讨》的言论中被纳入刺杀对象，他在恩铭被刺杀之后心怀危惧，特地向主持民政部的肃亲王善耆求助。^①不久，民政部探闻“有革命党人潜入京城，图刺某某大员”之事，严谕各区厅实力清查户口，并在车站、会馆、客栈等处，凡有洋装雍发、僧道、客商并形迹可疑之人，一律严密查探，免蹈安徽覆辙。^②京师不安，外省也谣言四起。清朝驻日公使杨枢报告称，传有革命党到扬州一带活动，以暗杀清朝大官为宗旨。^③江西巡抚瑞良、新疆巡抚联魁，由于皆为满人，也担忧身遭不测。在局外人看来，革命党的大规模暗杀活动，“事之有无，尚在疑似”，但“政府顾皇皇然不可终日”，则为不争的事实。^④

丁未皖案引发的满汉畛域问题，成为清廷各级官员的一个心结。一些满人官员开始防备汉族官员，相互猜忌，彼此隔阂逐渐凸显。两江总督端方犹如惊弓之鸟，在恩铭遇刺后不久，江宁提学使陈伯陶晋谒端方，“谈话间，以手探靴筒，若取物者。端方大惊，一跃而起，亟问何为。盖时距安徽巡抚恩铭被候补道徐锡麟刺毙未久，深有戒心也”。^⑤其猜忌之心与惊恐之状，由此可见一斑。与此同时，端方也备受友朋关怀。与其交好的李国杰来函告以天象不利江南，“夜观天象，荧惑光芒折入南斗，分野适应江南一带，虽新学家无此占说，究宜先事预防，以期弭象于未形”。天象之说未必完全足信，但恩铭被刺杀无疑为此“非常之象”的表征，况且数年来，长江一带水旱频仍，盗贼蜂起，“公负一时重望，尚祈加意珍护”。^⑥无独有偶，1907年7月9日，袁世凯亦致电被革命党点名暗杀的端方，“以我弟居心仁厚，断无恶报，但不可不加慎耳”，据驻日人员探报，“真暗党不过二百人，伏假多内渡”，此时亦应格外留意，宜多用北人，考查其详细履历，“弟主融见，人所共知。逆党忌弟才，故为藉口煽惑，似可将满汉相猜、渔人得利各节，剴切疏通，以执逆口”。^⑦在袁世凯看来，若由满人官员申明满汉互相猜忌的问题，更有利于稳定形势。在此前后，端方确有密奏化除满汉畛域之策。^⑧只是其言行相悖，被时人讥为“今日制造革命党之大工厂”。^⑨

7月13日，《申报》针对丁未皖案刊发署名“方驾舟”的《满汉平议》。该论将恩铭被戕一案，定为“我国不幸而演出最惨酷、最特别、普天下伤心动魄之恶剧”，对革命党一方批评其所持之主义何其狭，所守之范围又何其隘；对清政府一方则批评“善后之法，维何扬汤而止沸，不如正本而清源”，立即实行立宪，“破除界限，改革政体”。因此，评论呼吁凡热心国事者，应破除畛域，协力同心，“相与讲求进步，以尽立宪国民之义务，政治如何改良，种族如何调合，铸造新中国之种子”。^⑩这显然是国内立宪派人士的一贯论调。

外界舆论认为革命活动是满汉关系紧张化的诱因。“自革命军起，而满汉之见日甚，自暗杀

① 《关于应当注意汉字杂志〈民报〉记事之报告》，章开沅、罗福惠、严昌洪主编：《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第6卷，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18页。

② 《京师严查革命党》，《申报》1907年8月11日，第3版。

③ 《大官暗杀警告》，《东京朝日新闻》1907年7月19日，第3版。

④ 孙宝瑄：《忘山庐日记》下册，第1055页。

⑤ 徐凌霄、徐一士：《凌霄一士随笔》（一），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346页。

⑥ 《李国杰致端方函》，“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印：《甸斋（端方）存牍》，台北，1996年，第205页。

⑦ 《致两江总督端方电》，骆宝善、刘路生主编：《袁世凯全集》第16卷，第280页。

⑧ 参见李细珠：《清末预备立宪时期的平满汉畛域思想与满汉政策的新变化——以光绪三十三年之满汉问题奏议为中心的探讨》，《民族研究》2011年第3期。

⑨ 《尹克昌十五》，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19页。

⑩ 方驾舟：《满汉平议》，《申报》1907年7月13日，第2版；《满汉平议（续）》，《申报》1907年7月14日，第2版。

事起，而满汉之见又日深。我国自去年七月十三以来，预备立宪之声既腾达于中外，而革命之风潮不息。暗杀之手段所以日加烈者，其第一之争执在于满汉之不平等，故不先除满汉之界，虽日日预备立宪，不过成一立宪之空名词而已。”故平满汉之界应在实行立宪之先，早一日平满汉之界，即早一日成立宪之局；早一日实行立宪，即早一日弥革命之祸。^①此论指出的解决之道是否有效，一时难以验证，但其中化除满汉之界的意见得到清政府认可。

7月26日，直隶总督袁世凯奏陈实行预备立宪的十条管见，其一即为“满汉必须融化也”。他称立宪之国，首重合群，清朝统治中国已历数百年，时时以满汉畛域为诫，近又弛满汉通婚之禁，海内民众早已忘有满汉之界矣。然自孙中山以革命排满倡乱，“适当我内政多缺，外侮侵陵，彼所藉以造谤者愈多，彼之幻为谤张也亦愈甚，其处心积虑所在，尤欲使满汉互相猜忌，因猜忌而生防范，因防范而致冲突”。影响所及，“士大夫中容或有不识大体，不谙大计之人，慑于逆说，妄生猜忌，逞一时之意气，而未及深图，挟一孔之见解，而不复远虑，此风若长，大局可忧”，故应请饬下枢阁部院大臣，将近年所上融化满汉各条陈进行采择，订立切实可行的办法，使国内民众合群进化，达于宪政。袁世凯认为此不过预备立宪之基础，根本之计在于统治者亲诣太庙，昭告立宪。^②不难看出，所谓“士大夫中容或有不识大体，不谙大计之人”，显然指徐锡麟等人而言。袁世凯还刷印《扶植伦纪历陈大义通论》100份，张贴各州县，并颁发告示称，立国之道在于合群，“自近日革命排满之谬说，淆惑人心，指斥朝廷，离间骨肉”，稍明事理者本不易堕此术中，惟恐血气未定的少年为其所惑，天津各学堂、工厂、各局处及各道府州县厅，每于初一、十五两日由堂厂教员、管理员集齐生徒演说一次。^③

1907年8月8日，清政府接到张之洞电奏称，整理内政为抵制外患之根本，“方今革命党各处横行，人心惶扰”，须探源政务扼要，方能靖人心而伐逆谋，请特颁谕旨，布告天下，化除满汉畛域。“此旨一颁，人心自定，乱党莠民无可藉口”。^④8月10日，清政府饬谕内外各衙门妥筹化除满汉畛域之道，抵制革命之说。上谕：“我朝以仁厚开基，迄今二百余年，满汉臣民从无歧视。近来任用大小臣工，即将军、都统，亦不分满汉，均已量材器使。朝廷一秉大公，当为天下所共信，际兹时事多艰，凡我臣民方宜各切忧危，同心挽救，岂可犹存成见，自相分扰，不思联为一气，共保安全。现在满汉畛域应如何全行化除，着内外各衙门各抒所见，将切实办法妥议具奏，即予施行。”^⑤

时人孙宝瑄认为此诏“盖鉴于革命党之事也”，却又质疑此谕消除革命党活动的可能性。他戏称欲化满汉之见，须汉女放足，满男加冠，尽取满人姓氏之首字加于名上，使人忘其满籍。至于各省驻防，本为防汉人而设，既欲化除畛域，何如全部撤之，以坦诚示天下？^⑥而朝野官绅也纷纷上书建言裁驻防、改旗籍、筹八旗生计等问题。清政府颁布上谕，改革各地驻防八旗，试图化旗籍为民籍。由此可以看出清政府抵制革命排满的决心。

有学者注意到，慈禧谕令化除满汉畛域的同时，又命张之洞来京商议要事，“首在筹议革命

① 参见《论消除革命在实行立宪》，《申报》1907年7月27日，第2版。

② 《密奏请赶紧实行预备立宪谨陈管见十条》，骆宝善、刘路生主编：《袁世凯全集》第16卷，第337—338页。

③ 《通饬札发严禁革命排满之说告示》，骆宝善、刘路生主编：《袁世凯全集》第16卷，第383—384页。

④ 《湖广总督张之洞致军机处请代奏电》，故宫博物院编：《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71，北平，1932年，第7页。

⑤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33册（光绪三十三年），第133页。

⑥ 孙宝瑄：《忘山庐日记》下册，第1059、1060页。

党事件”。对于慈禧担心“出洋学生排满闹得很凶”的问题，张之洞答称：“只须速行立宪，此等风潮自然平息”。以立宪抵制排满，此为朝野一致的意见。^① 由于击毙恩铭的徐锡麟曾是清朝官费资助的留日学生，故慈禧与张之洞的此番谋划，无疑受到丁未皖案的直接刺激。^② 以立宪抵制革命排满，如清政府在恩铭被击毙之后相继宣布在京师设立资政院，各省筹办谘议局，只是在制度变革方面采取的措施。至于“筹议革命党事件”，尚有处置革命党策略的变化。

张之洞入京面见两宫之际，提出对“革命党处分不宜过严”。慈禧对革命党的态度也逐渐缓和，在召见民政部尚书肃亲王善耆等人时谕称，现下各省会党甚多，威势颇振，惟若辈青年血气，在外数年，略读外洋书籍，未免为邪说所诱，一时附和，务宜切实解散，勿事罗织，必有悔悟之时。时论以为，“外省之好事罗织者，其亦不可以已乎，亦徒为幸进者开一升官发财之捷径”。^③

不久，新入军机处的袁世凯与张之洞协议，均认为“以革命党嫌疑而罚罪者，是徒以陷人耳。以后若犯人之治罪，宜以其所犯之罪治之，甚不可以革命党嫌疑，为杀人之利器也。宜令长江一带，不可轻忽治罪”，并将此旨电达两江总督端方。^④ 袁世凯上奏驱散革命党之策：“革命不止起于留东学生，查其原始，系由党魁煽惑所致，其他省散布羽党，亦皆少年盛气之人一时为其所惑，必先秘拿党魁，余党随时妥设善法解散，倘剿捕过严，其党不以生命为惜，恐人心激变，南省无宁日。”^⑤ 他将矛头直指孙中山等革命党首领，颇获慈禧称许。8月23日，上谕称“近来匪徒谋逆，往往假借革命名词摇惑人心，奸狡情形尤堪痛恨。虽随时破获，而地方已被其扰害，后患不可胜言。惟有破其诡谋，直揭其叛逆之罪，不使藉词革命巧为煽诱”。各省督抚务须设法解散，勿任勾串固结，“果系著名首恶，或竟甘心从逆，仍予尽法惩治，弗稍轻纵。其被威胁迫及家属之不知情者，均为网开一面，概免株连，俾释疑惧，咸与相安”。^⑥ 这意味着清政府对待革命党的策略发生变化，抛弃了之前将革命党及家属一概株连的严厉政策，采取分化、解散革命党的措施，以期缓和革命对清政府的政治压力。

除了孙中山、康有为、梁启超三人之外，清政府对其他革命党、保皇党逐渐采取宽容态度。1907年间，执掌民政部的肃亲王善耆，既派遣湖南人士李步青赴日与梁启超接触，又差使与革命党关系密切的程家桢赴日暗中联络留日学界的革命党。^⑦ 此举意在积极谋求海外趋新党派的支持，化解革命势力对清政府的冲击。

三、海外革命党与立宪党、保皇党的反响

丁未皖案对政局的影响，不仅限于国内，还牵扯海外各党派、留学生及华侨界。从海外向国内输入革命，其影响如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中所称，当同盟会成立之后，革命风潮开始弥

① 李细珠：《清末预备立宪时期的平满汉畛域思想与满汉政策的新变化——以光绪三十三年之满汉问题奏议为中心的探讨》，《民族研究》2011年第3期。

② 《浙江巡抚张曾敳致外务部之咨呈》，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等编：《清宫辛亥革命档案汇编》第19册，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年，第386—388页。

③ 《日前肃邸同民政部左右侍郎》，《申报》1907年7月6日，第3版。

④ 《清国革命党之处分》，《汉文台湾日日新报》1907年10月2日，第1版。

⑤ 《饬筹解散革命党方略》，《中兴日报》1907年10月5日，第3版。

⑥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33册（光绪三十三年），第155页。

⑦ 章开沅：《辛亥革命与近代社会》，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52—253页；《关于应当注意汉字杂志〈民报〉记事之报告》，章开沅、罗福惠、严昌洪主编：《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第6卷，第118页。

漫全国,“其时慕义之士,闻风兴起,当仁不让,独树一帜以建义者,踵相接也。其最著者,如徐锡麟、熊成基、秋瑾等是也”。^① 丁未皖案发生时,孙中山的革命重心在两广地区,无暇顾及该案的政治影响。密切关注该案的革命党,主要是以章太炎、陶成章为首的东京同盟会人士。章太炎、陶成章与徐锡麟原为光复会同仁,且为浙江同乡,较其他同盟会会员而言,其感受自然有所不同。

在革命党尚未为徐锡麟、秋瑾举办公开悼念活动之前,有留日学生抢先在东京八旗会馆发起恩铭追悼会。在革命党看来,恩铭既死,“满洲学生伤其同类,无所致责”,实属情有可原。令他们所不齿的是,居然有某位汉人名士极力赞同追悼恩铭的举措,希望借此向清政府示忠,斥徐锡麟之举狂妄。^② 此位名士似指杨度。

留日旗人学生在创办《大同报》伊始,就与留日学界的立宪党建立起政治同盟,一致向革命党发难。在丁未皖案发生前,他们已邀请杨度为《大同报》创刊号题辞,因此为恩铭举行追悼会,得到杨度的赞同亦在情理之中。丁未皖案发生后,《大同报》主张满汉平等,不以一味排满或排汉为然。《大同报》1907年8月5日刊载晚清宗室盛昱遗像,题为“主张满汉平等者”。《中国之排外与排内》一文批评以排满或排汉解决满汉问题,实为“最盛最烈而招祸最巨”的排内主张,“我国人民方且如聋如聩,如疯如狂,如白痴,如精神病,同室操戈,倡言排满排汉,吾恐瓜分之祸,实肇于此”。故而不主张革命行动,以为“二十世纪非革命之世纪”,法国大革命未招致外患,只因其在19世纪,“至二十世纪之竞争世界,唱革命者已寂寂无闻,有之者惟俄”,鉴于日俄战争的结局,不应仿效俄国,否则很可能招致黄种人同归于尽,“是满人排汉为灭满主义,汉人排满为灭汉主义,满汉人互相排斥,是同归于灭主义,稍有人心者其肯令我国民罹此惨祸耶?”^③ 这显然是针对徐锡麟“灭尽满人”的口供而发,将此类革命活动归之为“野蛮行为”的行列。

针对留日学界追悼恩铭的举措及诋毁革命活动的言论,革命党也积极发起纪念徐锡麟、秋瑾的活动。9月7日,革命党在东京为徐锡麟、秋瑾等革命烈士开祭会,章太炎、张继、刘师培、何震均发表演说。刘师培主张暗杀,张继主张无政府主义,章太炎则嬉笑怒骂,将绍兴之狱归咎于蒋观云,“其人真可杀也”。^④ 在言论上,《天义报》与《民报》先后刊发纪念和评论文章。章太炎撰写《祭徐锡麟陈伯平马宗汉秋瑾文》、《秋瑾集序》等文,陈去病也以“南史氏”之名撰写《徐锡麟传》,表彰死难的革命志士。作为同盟会本部机关报,《民报》刊载了徐锡麟和秋瑾的照片,并有汪东以“寄生”笔名撰写的评论文章。他先是在《法国革命史论(续第四节)》中揭露和抨击清政府处置革命党的残暴,继又在《刺客校军人论》中颂扬刺客的精神,主张刺客“与军人相须为命,何有缓急之分”,只是不能持“专恃刺客可以集事”的妄人之论。^⑤

汪东对丁未皖案的政治影响给予积极评价。他指出,自恩铭被击毙后,京师宫廷震惊,大官惴惴不安,各省“封疆大吏背不贴席,有设军队以自卫者,有深居简出,谕道府以下免迎送者”。汪东从清廷上下惶惶不可终日的警戒状态嗅出“满政府之脆薄而易破”的政治信号,一因封疆大吏无人,环朝皆以张之洞、袁世凯、端方为封疆之首,经此事变,端方“畏心复炽,见

① 《建国方略》,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等编:《孙中山全集》第6卷,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238页。

② 寄生:《安抚恩铭被刺事件》,《民报》第16号,1907年9月25日,第7页。

③ 佩华:《中国之排外与排内》,《大同报》第2号,1907年8月5日,第18—19、20页。

④ 杨天石主编:《钱玄同日记(整理本)》(上),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03页。

⑤ 寄生:《法国革命史论(续第四节)》、《刺客校军人论》,《民报》第16号,1907年9月25日,第7页。

一属官，凛然若蹈虎尾，至以形迹疑似，遽令缚人”，传为笑谈；张之洞则“震惧实甚，某日啜茗，闻警，杯自手堕”；“袁氏饬属不得至驿旁窥视兵仗，凡平常得出入者，皆刻木作符，俟闻者验而后进”，“三人者皆为伪朝所倚重，异时撑拒义军，必藉其力，方可以悬揣得之，不幸畏缩若此，何以慰君父之心而副輿情之仰望耶”？至于恩铭被击毙，只是完成徐锡麟“欲杀四人”之一，其他如端方、铁良、良弼，“皆满人之雄，而汉民之所以集怨也”。在汪东看来，端方、铁良尚不足虑，所可虑者为曾经留学日本的良弼，因其留学时已留意侦查革命党的活动与组织，熟知青年学生的弱点，“请以爵号翎顶为羁縻党人之具”，使许多英俊之士深陷牢笼，“以为至乐，今且有作文字以易金币者，名节不讲，于是为极”。因此，呼吁有深知徐氏遗意者，“担负其未竟之责，以为满人惩戒”。^①这反映出东京革命党仍以侠客、刺客之流的暗杀活动来定位丁未皖案。不久，《民报》相继刊文驳斥《大同报》的言论，积极回应立宪党的论战。

1908年，南洋的保皇党与革命党也围绕丁未皖案展开论战。为了在南洋宣传革命，增加华侨界的反清势力，南洋革命党利用恩铭被击毙及徐锡麟被杀之事大做文章。先是刊文揭露“满人逞其残暴本性”，将徐锡麟剖腹取心，以相报复。2月，南洋革命党又在新加坡排演徐锡麟击毙恩铭的戏剧，“其中情节，动人心目，并有秋瑾女士含冤被戮，更令阅者激发天良，亦由著名老倌勉力拍演，致当日之情景了然在目”。之后，“邓君毅登台演说，高唱民族主义，解释立宪之不能兴中国，必须由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并行，语气激昂，听者无不奋臂欲立，鼓掌之声不绝。可见南洋民智日开，人心思汉，此剧本之感化于人大矣”。^②

9月7、8日，新加坡保皇党舆论刊物《南洋总汇新报》连续刊载“平实”撰写的《革命党之真相》一文，将革命党划分为五派，一一进行诋毁，且称“通观彼党自陈星台（引者按：陈天华）死后，无一真爱国者。通观中国，除徐锡麟外（徐原不在其党）无一真排满者”，讥讽革命党仅仅是“以野心而革命，故欲以暴动逞能”。^③与徐锡麟同为光复会成员的陶成章，此时正在南洋活动，阅此言论后，立即予以反驳。9月9日，《中兴日报》刊发《规保皇党之欲为圣人英雄者》一文，谓保皇党所言“中国之真正能排满者，仅有徐锡麟。斯语也，何为卑视我国国民资格之甚也”，列举革命志士的壮举及徐锡麟的“满人非真能立宪者，不过以之骗汉人”和“立宪愈立得速，则革命愈革得快”言语，讽刺保皇党反而借助徐锡麟之案，“日聒满清政府以立宪”，“因之以为昏暮乞怜之举，天理何在！良心何在！”^④

9月12日，《南洋总汇新报》继续宣扬徐锡麟与革命党的分歧，称“徐在日本，尔党所鄙为奴隶者也，徐君身不改装，口不革命”，后入官场，仅以击毙恩铭之事，“聊可吐气，其前则非尔党，尔党不过引以自豪”。该文作者“平实”自称奔走两湖、三江之间，以徐锡麟为其所最钦佩之人，将其引为同道中人。^⑤保皇党自诩为徐锡麟的知交，引发陶成章抗议，决定详述徐锡麟生前活动，“使汝不至再为门外汉”。至于恩铭被杀事件，此前各方往往均视之为暗杀，陶成章却否认暗杀，视之为一次有预谋的起义暴动，“平实平实，汝亦当知徐锡麟之杀恩铭，乃非暗杀而暴动也。不然者，何由而欲占军械局，而革命告示更何自来？然穷源竟委，皖江案

① 寄生：《安抚恩铭被刺事件》，《民报》第16号，1907年9月25日，第4—5、3页。

② 《满奴奸志闻》，《中兴日报》1907年8月20日，第8版；《剧本改良》，《中兴日报》1908年2月24日，第4版。

③ 平实：《革命党之真相（续）》，《南洋总汇新报》1908年9月8日，第1版。

④ 巽言：《规保皇党之欲为圣人英雄者》（《中兴日报》1908年9月9日），汤志钧编：《陶成章集》，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14页。

⑤ 平实：《驳巽言》，《南洋总汇新报》1908年9月12日，第1版。

情之起发，不在于丁未五月廿六日徐锡麟之枪杀恩铭，而在丙午九月初六日之浙江杭城查拿党人（内有粤人）。^①陶成章后来撰述《浙案纪略》，以史法记述浙籍革命志士的壮举，与此次论战恐不无关系。

陶成章与“平实”之间的论战，逐渐升级为革命党与保皇党之间的政见论战，时在新加坡的孙中山也参与其中，以“南洋小学生”的笔名先后撰写文章，批驳“平实”对革命党的诬蔑，正面宣传革命党的起义活动及政治影响。

总之，围绕安徽巡抚恩铭被击毙、革命党徐锡麟牺牲一案，日本东京、南洋地区的革命党与立宪党、保皇党之间在舆论上展开了政治论争，并透露出继续推动暗杀的信息。海外革命党将徐锡麟视为暗杀的英雄，效仿其暗杀清政府官员的举措。踵而行之者，如1909年陶成章拟在日本建立暗杀组织，1910年汪精卫等人赴京密谋暗杀摄政王载沣，刘思复等人于同年在香港组织了“支那暗杀团”。连向来行事稳健、反对暗杀行为的黄兴在黄花岗起义失败后，也“亦生一愤愤不平之气，决欲行个人主义”，对于暗杀团的经营与活动颇为热衷。^②

通过海外与海内的互动影响，“暗杀”成为清末政局的一种政治风气，连清政府也招募刺客暗杀孙中山。时评对此不以为然，“革命党以暗杀手段倾覆政府，政府亦以暗杀手段倾覆革命党。革命党因无力倾覆政府，而出于暗杀。政府亦因无力倾覆革命党，而出于暗杀。革命党欲行暗杀手段，不必构募刺客。政府欲行暗杀手段，必先构募刺客。革命党之暗杀，去年徐锡麟案是也。政府之暗杀，今日募刺客杀孙文是也。上下以暗杀相竞，则暗杀风潮，将愈激而愈烈，国事尚可言哉。”^③事实上，从清末到民初，暗杀之风始终是影响国内政局的一个重要因素。

另一方面，自同盟会成立后，革命党在海外积极联络中国留学生、华人华侨，乃至活动外国政商各界，加之在日本、南洋、美洲等地发行革命书报，鼓吹革命舆论，已引起清政府的高度重视，故有1907年袁世凯献四策之举，希望消除革命党的影响。^④此后同盟会仍然依托海外，于1907年、1908年的两年间在广东、广西、云南等地区连续开展起义活动，不断冲击清政府统治的固有秩序。革命舆论与革命活动的政治压力，使清政府不得不调整固有制度设置和军事布防，希望能够防范革命势力在全国的蔓延。革命党的活动与影响，从海外传入海内，加上国内立宪团体的压力，迫使清政府的改革措施不断调整。

四、清政府调整长江防务

鉴于丁未皖案的教训，清政府一方面加快筹办预备立宪的进程，以设立资政院和筹办各省谘议局，吸引朝野趋新士人远离革命排满的阵营；另一方面又设法融合满汉关系，采取缓和处置除孙中山等领袖人物之外的革命党的政策，分化和瓦解革命党阵营及潜在的革命势力。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清政府对革命党的防范有所松懈。与之相反，为了避免长江流域再次出现类似丁未皖案的革命活动，清政府令沿江督抚整顿长江防务，并出台了“巡缉长江章程”。

尽管长江流域的革命活动，在孙中山拟订的同盟会革命方略中居次要地位，可是旅居日本的四川、两湖、两江等地包括同盟会及光复会的许多革命党人，仍然将长江流域视为经营革命和举事的要地。1907年在东京组织成立的共进会，即以在长江流域举事为革命目标。自1906年

① 巽言：《再规平实》（《中兴日报》1908年9月14日），汤志钧编：《陶成章集》，第119、121页。

② 《复吴稚晖函》，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等编：《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536—537页。

③ 《第二杨衢云又将出》，《中兴日报》1908年2月26日，第2版。

④ 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第393—394页。

12月萍浏醴起义后，长江中下游地区不断传出革命党秘密运输军火与举事的传闻。1907年7月，安徽的丁未皖案与浙江的秋瑾案，似乎又印证此前的种种传闻，清政府将沿江警讯瞬间升级。

获知安徽巡抚恩铭被击毙后，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端方立即着手加强长江防务。张之洞严饬所属文武于武汉一带严防，并特派31标两营拔队赴安徽。端方亦恐大局有变，密电长江上下游文武大员择要防堵，并于来往轮船、民船严密搜查，如有形迹可疑之人暨违禁物品，即行截留。^①端方还电令沿江沿海各电报局暂停收发安庆密码商电，以防会党暗通消息。^②直隶总督袁世凯亦应端方之请，电“海圻号”巡洋舰速赴南京，听候调用。^③7月8日，袁世凯转军机处电：安徽匪党滋事，巡抚被戕，殊堪骇异，沿江各省素多匪徒，多以革命排满为煽惑之计，更恐各处闻风响应，须分电沿江各省一体严密防范，以消隐患而安人心。^④7月9日，江西巡抚瑞良称：“窃虑该匪党难保不潜匿各埠，即电飭九江地方文武，及湖口镇总兵官一体严密查拿防范，谨当遵旨妥为布置，冀消隐患。”7月10日，新任安徽巡抚冯煦电奏善后事宜，“宁、鄂水陆军队昨已到齐，领宁军者为朱道恩、余道大鸿，领鄂军者李道孺、张镇彪，均经扼要驻扎，分段防巡”。安庆藩库、军械所、火药库、支应局，由宁军守护；芜湖、大通一带，由宁军江元、南琛两兵轮及鄂军楚材、楚有两兵轮巡逻震慑。^⑤长江一带各督抚严防死守，上下游同时戒严，牵一发而动全身，以至于《申报》刊载“草木皆兵”的漫画讥之。^⑥

旁观者或许可以从容观望，局中人难免疑虑丛生。7月13日，袁世凯致电端方，“探得逆党现因内地严查军火，拟租小兵船五艘、小鱼雷艇十艘装运伪军及军械等，用各国旗号”，暗中运入长江一带，接济革命党的军火，“前船已订用犹太人驾驶，七月由大西洋陆续东来”。对于此类探报，袁世凯无法确定真伪，“此虽未必可信，但亦不可不防”，请密饬下属随时侦察。^⑦端方原本已于13日致电湖口杨镇台，探闻逆党密运铜炮三座、快枪五百支，“潜赴南昌，请派船严密查缉，并饬所属营汛一体查拿，勿稍疏懈”。接袁世凯电后，他又于14日致电上海提督萨镇冰，“装运伪军及军械”，用各国旗号夜入长江，各关道应早作布置。“前船已订用犹太人驾驶，七月由大西洋陆续东来”，“逆党屡次暴动，均被扑灭，势必更出诡谋。”^⑧13日，江苏巡抚陈夔龙也遵旨饬属严缉沿海革命党，各“司、关、道、局、府、厅、州、县及水陆各营，一体认真防范，严定考成”，“各学堂、各军队人员，尤须不动声色，加意考核”。^⑨

不久，湖北传闻搜获私运的大批军火，且拿获自称为孙中山从侄之人。湖广总督张之洞甚至接到匿名威胁电文，“历数其庚子年来诛锄革命党之罪，谓不出六七月，必以炸弹断送尔命”。张之洞遂严饬各关、道、局员及洋关人员认真稽查大包捆载之件，逐一开包查验。在武昌，警察发现一批洋装断发之人新租大朝街房屋，遂“入内搜查，果获快枪二千余杆、子药五万余颗，

① 《电三》、《电四》，《申报》1907年7月9日，第4版。

② 《电五》，《申报》1907年7月10日，第4版。

③ 《致两江总督端方电》，骆宝善、刘路生主编：《袁世凯全集》第16卷，第271页。

④ 《致东三省总督徐世昌等电》，骆宝善、刘路生主编：《袁世凯全集》第16卷，第276页。

⑤ 《为遵旨严缉九江等处并赣省安静事》、《为布置皖抚恩铭被戕案善后各事》，电报档，档号：2—04—12—033—0597、2—04—12—033—0609，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⑥ 《草木皆兵》，《申报》1907年7月10日，第18版。

⑦ 《致两江总督端方电》，骆宝善、刘路生主编：《袁世凯全集》第16卷，第291页。

⑧ 《两江总督端方致湖口杨镇台电报》、《两江总督端方致上海萨镇冰电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等编：《清宫辛亥革命档案汇编》第28册，第37、81—82页。

⑨ 《为遵旨布置苏省严缉革命党事》，电报档，档号：2—04—12—033—0617，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并拿获四人,有三人口操绍兴音,一人口操粤语,自认为孙汶从侄不讳”。^①此事真伪不得而知,但一经《申报》报道与舆论渲染,无疑为各种传闻增添声势。

面对长江中下游地区督抚纷纷奏陈革命党活动的电文,加之报章舆论的传闻,逐渐令清政府疑虑重重。张之洞电奏称“孙文密谋七月大举起于长江”,更令清政府大惊失色。^②两湖、两江是清朝钱粮重镇,也是英国、日本等列强的利权所在地,一旦暴发革命,势必会使清政府处于被动局面。有鉴于此,1907年7月17日,军机处电寄两江总督端方、长江水师提督程文炳、湖广总督张之洞等沿江各省督抚、提督,会奏巡缉革命党的章程。

近来沿江一带,匪徒充斥,引诱勾结,藉端生事,摇惑人心,亟应严密查缉。水师提督本有巡查长江之责,着端方会商沿江督抚及该水师提督,妥议巡缉章程,详细具奏。并着程文炳即行常川梭巡沿江各处,认真查缉,勿得拘守分阅上下游常例,总期有匪必获,不准稍涉疏懈,以专责成而弭隐患。^③

7月20日,军机大臣又字寄直隶、两江、闽浙、湖广各总督,江苏、安徽、山东、浙江、江西、湖南各巡抚,上谕:昨已有旨飭端方等会商“巡缉长江章程”,现值人心不靖,隐患宜防,应如何布置,以期有备无患之处。着沿江、沿海各督抚体察情形,妥筹办理。袁世凯察到所谓“隐患宜防”,当指孙中山的革命党而言。^④长江水师提督程文炳首先想到的是长江防务紧要,以后往来密电甚多,应请颁发辰字密码一本,以便自译。端方颇以为然,即电请外务部酌量发送。外务部接电,即差专人将密电本原件送至太平府。^⑤

至于如何拟订章程,各督抚起初意见分歧。此前“长江防务章程”系1900年夏间所定,时以“长江防务紧要,水师兵单,不敷分布,请飭沿江五省督抚不分畛域,节节设防,以期首尾相应”。^⑥湖南巡抚岑春蓂力主大幅度进行改制,由五省督抚联合奏请专门简派一名大员,负责巡阅长江。对于此议,张之洞不以为然,认为“此次谕旨,系飭沿江查缉匪党,并非大有更张”,所以此次拟订章程应以守成为要,只可相题行文。^⑦袁世凯也主张守成,甚至认为此前在长江节节驻防的办法过于大张旗鼓,未必能收实效。他电告端方,“缉查逆匪,似不外乎重悬赏格,广设侦探,并精选步兵队一千,炮兵一百,授以利械,统以雄将,日日作战备,扼要屯扎”。较之沿江节节驻防,尤可得力。^⑧

端方参照袁世凯的建议拟写电稿,于1907年8月17日会同湖广总督张之洞、江苏巡抚陈夔龙、江西巡抚瑞良、安徽巡抚冯煦、湖南巡抚岑春蓂、江北提督荫昌、长江水师提督程文炳联衔致军机处代奏电,拟订“巡缉长江章程”三条办法:其一,严密探访。向来会匪及革命党行

① 《武昌拿获孙汶从侄并大宗军火(汉口)》,《申报》1907年7月27日,第4版。

② 《七月果有革命党起义耶》,《中兴日报》1907年8月27日,第2版。

③ 《奉旨沿江匪徒充斥勾结着端方妥议章程具奏事》,电报档,档号:1—01—12—033—0116,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④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33册(光绪三十三年),第110页;《致两江总督端方电》,骆宝善、刘路生主编:《袁世凯全集》第16卷,第318页。

⑤ 《为长江防务紧要祈发密本事》、《为部发提督密电本已将原件专送事》,电报档,档号:2—05—12—033—0478、2—04—12—033—0728,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⑥ 《德宗景皇帝实录》卷445,光绪二十五年五月壬戌条,《清实录》,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影印本,第57册,第859—860页。

⑦ 《致江宁端制台、长沙岑抚台》,赵德馨主编:《张之洞全集》第11册,武汉:武汉出版社,2008年,第359页。

⑧ 《致两江总督端方电》,骆宝善、刘路生主编:《袁世凯全集》第16卷,第322页。

踪诡秘，尤须重悬赏格，广设侦探。此前湖北的沿江缉捕营和江苏的探访队拟更名为巡缉队，将各种会匪、枭匪、盗匪均视为查缉对象。湖南、江西、安徽三省应立即仿办，彼此互通消息，不分畛域，以协助长江水师所不及。其二，整顿水师。长江水师由程文炳专门负责，将本标及各镇师船切实整理，不时巡逻上下游，再由江、鄂各拨兵轮一艘，交程文炳应用，如有不敷，再行酌拨。师船枪炮，亦改换后膛快炮，每营五尊，由江、鄂按本籍船只凑拨应用。其三，预备精兵。鉴于“节节设防，势分费多，且难得力”，拟简练精兵，授以利械，并备运船，两江即调舰队实力扩充，湖北新制兵舰因饷需问题尚未招配弁勇，遇事即用寻常差轮运载驰往，其他各省无舰队可借，应各选步队、炮兵扼要屯扎，添置一二艘轮船就近停泊，一遇警报，即开驶捕拿。新增经费均作正开销。至于革命会党私运军火一事，已飭江海各关道会同税务司，注意盘查夹带货物。“惟是沿江、沿海地面延长，防缉事宜自应以各省辖境为断，藉专责成，尤须联络一气，互为策应”，长江水师所辖，上至狼山镇内洋水师通海营汛为止，至于上海吴淞口洋面，应责成提督萨镇冰专门负责。^①

由此可见，新拟订的“巡缉长江章程”抛弃了设专员统管、沿江节节设防等主张，最终虽声称须联络一气，互为策应，实质上仍是以各省辖境为范围，各自办理防务。对此，军机处转达上谕意见，以为所筹尚属周妥，应即妥速筹办，认真防范缉查革命党。^②

沿江各省督抚以为此事告一段落，岂料清政府格外重视，于9月10日电催端方等督抚：前奏声明详细章程由各省妥筹，将近一个月仍未得报，令端方分催各省，迅速报告具体筹办情形。^③9月11日，端方电奏，已电催湖南、江西、安徽各省督抚，至江宁一带，已议有端倪，俟长江提督程文炳来南京时，再商酌定议。还称“近来沿江地方一律安靖，堪以仰慰圣怀”，仍飭属认真巡缉，不敢稍有松懈。^④安徽巡抚冯煦不敢耽搁，9月12日即电奏称，安徽江防上自宿松接江西界，下至和州接江宁界，计七百余里，其中以芜湖最为复杂，大通次之，故江防重在芜湖一带。根据会奏章程的原则，安徽防务章程包含六方面：（1）改良巡警，作为稽查会党的主要机关；（2）稽查轮船，以防党人混迹及夹带军火；（3）稽查民船，防止由内河私运军火入江；（4）整顿巡防，由芜湖营参将李振标督率本省巡防队，以辅长江水师所不及；（5）添购兵轮，令其上下游弋，与江、鄂、赣省及长江水师互相策应；（6）增设探访队，选募勇丁百名，于紧要各埠或常驻，或暂巡，自汉口至上海之间，亦令人不时打探消息。^⑤

丁未皖案的惨剧，使清政府极其重视长江防务。9月19日，军机处又字寄陆军部、直隶、两江、湖广各总督，山东、江西、湖南各巡抚及云南提督，“现在长江一带地方盗贼充斥，会党繁多，亟宜严加防范，免致滋生事端”，特派云南提督夏辛酉统带所部，并酌量添募营队，前往沿江一带，扼要屯驻，作为长江游击之师，会同沿江各督抚筹办长江防务。^⑥这显然不同于张之洞、袁世凯等人的守成办法，更接近于湖南巡抚岑春蓂所奏的添派专员负责长江防务。

清政府在长江流域的人事安排，打破了长江防务的旧有格局。两江总督端方与江北提督荫

① 《为奉旨严缉沿江一带党众现筹办法事》，电报档，档号：2—05—12—033—0599，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② 《为著照所筹认真防缉事》，电报档，档号：2—05—12—033—0608，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③ 《奉旨会商沿江巡防著端方分催各省奏报事》，电报档，档号：1—01—12—033—0141，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④ 《为宁省沿江巡防章程已议有端倪事》，电报档，档号：2—04—12—033—0827，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⑤ 《为筹办皖省沿江防务事》，电报档，档号：2—04—12—033—0846，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⑥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33册（光绪三年），第191页。

昌、江苏巡抚陈夔龙、长江水师提督程文炳等人不得不再次商议新章程的条款。9月23日，端方等人联衔奏称，“由外洋接济军火费用，踪迹诡秘”，彼此勾结，时有举事之说。因此，非广设侦探，无以探其踪迹，非预备精兵，无以速平其乱。现将巡缉队、舰队议订详细章程，飭令各司令官及各队官切实遵办，平时分路巡查，各专其责，一有警讯，则彼此知会，互作应援。^①

与此同时，端方等人还拟订详细的《长江巡缉总章》《江南巡缉章程》《长江舰队巡缉章程》《陆营巡缉章程》和《长江水师分段巡缉章程》等章程。其总章“区画办法”称：（1）设立巡缉队，责令侦查革命党匪，严密缉拿，并兼伺察各种会匪、枭匪、盗匪，毋令蔓延。（2）整顿水师，拨舰换炮，筹济探访经费，由周文炳督率，不分昼夜，切实梭巡。（3）暂编长江舰队，专派知兵干员统带，遇有匪警，即前往查办。（4）配备陆路军队，补水师舰队之不足，将旧陆营汰弱留强改编为巡防队，驻于沿江所有重要地点。（5）分驻新军，因近来各处变乱事起仓促，即以第九镇34、36两标作为游击之师。清朝统治者认为章程尚属周妥，着即督飭水陆各营认真防缉，务收实效，勿得徒托空言。^② 细绎端方等人所拟章程，仍是基于旧有的长江布防力量而定，并未虑及如何安置新调来的夏辛酉所部。“巡缉长江提督”究竟驻扎何处、如何筹办饷需、如何会同巡缉等问题，都未见于端方等人的奏折。究系无心，抑或有意？

夏辛酉虽挂名云南提督，其时已在北洋统兵。他此番奉命南下办理长江防务后，未立即带兵南下，而是进京“面圣”，于1907年10月29日、1908年1月1日先后两次获召见。在此期间，他还上奏筹办长江防务及请拨款项等事宜，奉旨由度支部速议如何筹款和拨款。至于军队屯驻和巡防事宜，仍会同沿江各督抚筹议。^③ 问题在于，夏辛酉所部移驻长江，不仅冲击了原有长江布防的秩序，而且还需要沿江各省海关承担42万两饷银，引发各方不满。

1908年初，因江浙交界地方发生动乱，清政府命夏辛酉率部南下，“各军应归两江督臣端方节制调遣，则布置周而事权一，或不至更有疏虞”。与此同时，还拟派在北洋统兵的甘肃提督姜桂题率部南下。^④ 这反映出清政府对长江防务的担忧与重视。“姜桂题南下之军，所以直接夏辛酉防驻长江之后，以耀军威而慑南服也”，论者实为“朝廷忧乱孔亟”的突出表现。^⑤ 然而，沿江各督抚对此却有所保留。两江总督端方、湖广总督赵尔巽、江苏巡抚陈启泰、浙江巡抚冯汝骥联名发电，阻止姜桂题率部南下，称“股匪业经剿捕解散，分布营队已属严密，后有鄂军为之声援，自不虞兵力单薄。其所拟治匪办法，亦颇中肯要，果能实力经营，闾阎当可安堵”。况且，尚有夏辛酉部本系长江游击之师，亦可调往。接此电后，清政府飭谕端方等人勿徒托空言，倘再有“匪徒”举事，唯该督抚等人是问。^⑥

夏辛酉尚未率军南下，即于1908年2月9日病逝。^⑦ 清政府遂命姜桂题接手夏辛酉原部各营，再会合原统6营5000人开往长江一带，扼要驻扎，作为长江游击之师，仍会同沿江各督抚

① 《两江总督端方等奏为遵旨筹议长江巡缉详细章程事》，军机处录副，档号：03—6004—074，缩微号：449—1628，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② 《两江总督端方等呈长江巡缉事宜筹拟详细章程清单》，军机处录副，档号：03—6004—075，缩微号：449—1633，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③ 《交旨妥办江防事宜》，《申报》1907年12月11日，第5版。

④ 《蔡乃煌防匪条陈之影响》，《申报》1908年1月24日，第4版。

⑤ 《丁未年中国大事论略》，《申报》1908年1月27日，第2、3版。

⑥ 《廷寄江鄂苏浙督抚姜军暂缓开拔》、《江鄂苏浙督抚谏阻姜军南下电奏》，《申报》1908年1月27日，第4版。

⑦ 《电二》，《申报》1908年2月9日，第3版。

筹办江防事宜。^①在驻地问题上，姜桂题先议驻扎江阴，后又议改安庆，经过安徽巡抚冯煦与南北洋大臣商议和调整，最后决议改驻浦口。^②

驻地之外，饷银问题也逐渐解决。无论是夏辛酉部，还是姜桂题部，都属于北洋统领。因此，长江游击之师的设置也可视为北洋势力的南移。在长江驻防新军经费无着落时，北洋自然需要筹济款项。杨士骧奉旨筹拨该部饷银时，正值夏辛酉出缺及江防新军添募方式改变，由夏辛酉与姜桂题两部整合为5000人，因两部原各有饷银，再加上部解之款、沿江各关前认之款，又从运、关两库及部拨北洋款内共筹银20.4万两。但杨士骧很快反悔，称只能从运、关两库抽8万两，其余由度支部另行筹议。^③

姜桂题本为北洋统领，到任后也仿行北洋制度。他拟在长江一带仿照北洋设置宪兵，遂派员到京面谒陆军大臣铁良，求调人员，并往见赵秉钧侍郎，拟在民政部请调数名得力侦探南下听候差遣。^④随后，他又改编原定长江游击之师的编制，定名为“沿江巡防队”。^⑤虽然他在任未满一年，即奉命调补直隶提督统武卫左军，但是沿江巡防队仍留长江驻防。^⑥此后两三年间，因海军建制问题，长江舰队的布防虽略有更改，但受重视程度未有改变。^⑦1911年间，因江苏、安徽、两湖等地水灾肆虐，“虽经朝廷颁帑赈抚，但杯水车薪，恐难济事。灾区既广，而饥民散布于野者益众，诚恐匪党乘间煽惑，后患何堪？所有长江防务此时最为吃紧，拟请加派兵轮分布于各该要塞，妥为防范，上紧巡缉，以固江防而卫治安”。^⑧

章程的有效实施，关键在于得人。自新章程实施之初，沿江督抚与新设提督之间就存在争执，彼此难以密切配合协调。至于新驻的姜桂题所部，又“素无纪律”。^⑨加之沿江督抚也未必得人，如后任安徽巡抚朱家宝，时人以为其“以附袁建节（由知县至开府不过数年），无才略可言，恐误东南大局”。^⑩武昌起义爆发后，沿江各省迅速响应，成为革命党与清政府和谈的政治资本。虽然1911年的革命狂潮，再次印证了清政府强化长江防务的必要性，但是清政府大势已去，人心涣散，此前苦心经营的长江防务最终未能收到实效，无法挽救清朝的覆灭。

五、余 论

丁未皖案犹如催化剂，在清末复杂多变的政局中产生了一连串反响。它加快了清末资政院的

① 《旨派姜桂题接统夏军》，《申报》1908年2月14日，第5版。

② 《电商姜军驻扎营地》，《申报》1908年2月25日，第3、4版。

③ 《直督杨奏江防新军饷项设法酌筹折》，《申报》1908年3月8日，第2版。

④ 《姜军预备附设宪兵》，《申报》1908年5月7日，第5版。

⑤ 《德宗景皇帝实录》卷586，光绪三十四年正月癸卯条，《清实录》第59册，第748页。

⑥ 《简员接充姜军之电音》，《申报》1908年9月21日，第4版。

⑦ 1909年，统领长江舰队的沈寿堃称：“长江防务紧要，各种会匪时或潜滋，若非认真梭巡，无以戢暴安良，以期安谧。拟将长江一带分为五段：一、岳州新堤至荆州一带为第一段；一、武昌、汉口至九江等处为第二段；一、九江至安庆等处为第三段；一、安庆、芜湖至南京等处为第四段；一、南京、镇江、江阴至上海等处为第五段。平时每一段酌派一舰或两舰分驻防守，无事时则认真训练，一遇邻近有事，准其先行驰往保护，随时电禀该队统领，再由统领禀报海军大臣察核。”（《长江舰队分段巡防之规画》，《申报》1909年11月6日，第4版）

⑧ 《海军部注意江防》，《申报》1911年7月31日，第5版。

⑨ 《恽毓鼎致端方函》，“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印：《恽斋（端方）存牍》，第212页。

⑩ 恽毓鼎著，史晓风整理：《恽毓鼎澄斋日记》（2），第421页。

设立及各省谘议局的筹办,乃至长江防务的重新调整。在清政府的人事安排上,由于安徽巡抚恩铭之死,在安徽巡抚一缺的善后问题上,又被庆亲王、袁世凯等人用来伐异,后来又借广东黄冈之变,完成了军机大臣林绍年(调河南巡抚)、河南巡抚张人骏(调两广总督)、两广总督周馥(解职)等内外重臣的人事更迭。此后,革命党在广东、广西、云南等地举事,再次引发中英、中法的交涉及桂越边务的调整。这些变革均可见清政府、督抚与革命党之间的政治较量。

值得注意的还有恩铭之死在革命党阵营中产生的影响。徐锡麟击毙恩铭,本与孙中山及同盟会无涉,而是以光复会为主的江浙革命党的壮举。徐锡麟在供词中也声称与孙中山等革命党无关。但在清政府看来,徐锡麟的矢口否认,或许反而变成了为同党洗脱嫌疑之举。在此前后,由于海内外基本上已将孙中山视为革命党的领袖人物,徐锡麟的供词同样无法取信于报界。

在恩铭死后不久,《申报》刊载了得自安庆的“秘闻”,称安徽巡抚恩铭中弹一事,系“因孙汶密运军火来华,均由长江一带大通等处潜运,恩得信最早,即分咨各省严查,故该党怀恨甚深,有此报复”。^①“报复”之说,将徐锡麟与孙中山视为密不可分且相互照应的同一阵营。此说固然未必与事实相符,却在很长时间内令清政府与国内民众信之不疑。随着革命党与立宪党、保皇党先后在东京、南洋地区围绕此案展开论战,使得徐锡麟与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在舆论上逐渐被塑造为政见统一的整体,扩大了革命主张与革命活动的影响力。甚至后来与孙中山分道扬镳的陶成章欲在日本组建暗杀组织,亦不得不声称“若办必先声明与孙文无涉,免至为人所借用”。^②

这无疑又使清政府及旁观者难辨虚实,疑虑丛生,遂笼统地将全国各处的反清运动均视为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活动,不得不加快改革以应对革命的步伐。事实上,法国驻华公使早就注意到,从1907年开始,“中国政府终究是用他的名字(引者按:孙中山)来指称那股威胁它的力量的”,^③即为旁观者的证言。就此而论,在武昌起义之前,清政府如何认识孙中山及革命党的历次革命活动,亦应纳入研究者的关注视野。

〔作者安东强,中山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广州 510275;姜帆,广州行政学院党史党建教研部副教授。广州 510070〕

(责任编辑:武雪彬)

① 《电二安庆(同日午后八点)》,《申报》1907年7月8日,第4版。

② 《与某某书》,汤志钧编:《陶成章集》,第154页。

③ 《孙逸仙和中国骚乱 巴思德致外交部长先生》(1907年6月13日,北京),章开沅、罗福惠、严昌洪主编:《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第7卷,第56页。

north and the south, showing that the juxtaposition of Yan Zi and Mencius had become common parlance and that orthodox Neo-Confucian teachings had been initially established. An edict issued in the sixth year of the Shaoxing reign period by Song Emperor Gaozong, together with Zhu Xi's Four Books, built an orthodox discourse in which the status and influence of Mencius gradually superseded that of Yan Zi. When the Song Emperor Lizong brought together the orthodox teachings of the court and those of the common people in the officially published "Thirteen Eulogies of Orthodox Teachings" (*Daotong shisan zan*), Mencius was for the first time the sole Second Sage. As Neo-Confucianism spread to the north, Yuan Emperor Wenzong formally gave Mencius the title of Second Sage (*yasheng gong*), and changed Yan Hui's title to Restored Sage (*fusheng gong*). The twists and turns in the shift of the Confucian designation of "Second Sage" from Yan Zi to Mencius illuminate the emergence of Neo-Confucian orthodoxy in the Song and Yuan dynasties and the consolidation of its interaction with the political system.

From "Monopoly Tax" to "Foreign Tax": The Canton Customs System from 1843 to 1854

Ren Zhiyong (62)

After the First Opium War, the Qing government was forced to open five trading ports in the southeast. This meant that the Canton Customs ceased to be the only trading port, thus destroying the former system. From 1843 to 1854, in response to this change, the Canton Customs made adjustments to its institutions and staff, relocating and adding tax offices with more than 100 clerks. However, the Qing government and Guangdong local authorities, bogged down in increasing the number of clerks, failed to make significant adjustments to the selection of customs superintendents and key personnel. In terms of foreign (barbarian) tax policy, tax regulations, tax rates and fiscal periods were unified, but no body for foreign tax revenue was established. In terms of tax revenue, the fortunes of the Canton Customs fluctuated as the income of Shanghai's Jianghai Customs rose sharply; not only had the trading center shifted, but a huge amount of smuggling was going on. The rise in status of the Jianghai Customs indicated that the Guangdong-based tax system would be difficult to sustain. With regard to foreign tax expenditure, the submission of expenditure reports to the throne continued the confused financial reporting of previous periods and the practice of turning over substantial income to the Ministry of Revenue and the Imperial Household Department. The evolution of the Canton Customs shows how the Qing government of the time intended to "restore the old system" in a political sense, and "follow the path inertia" in action, policies that aimed to maintain the Canton Custom's leading position.

The Assassination of the Governor of Anhui in 1907 and the Late Qing Political Situation

An Dongqiang and Jiang Fan (79)

The unforeseen assassination of the Manchu governor of Anhui in 1907 had an impact on the late Qing political process. At the top level, it affected the direction of political trends at the time, indirectly driving the Qing government's decision to establish a Political Consultative Council (*Zizheng Yuan*) and a planned Consultative Bureau (*Ziyi Ju*); turned the spotlight on Manchu-Han relations, revolutionary parties, etc. in public opinion and outside the court; and prompted the Qing government to change the earlier defense pattern in the middle and lower reaches of the Yangtze River in order to resist the development of revolutionary forces, a move that triggered a game between the Qing government and local governors of areas along the river. This paper provides comprehensive picture of the contests and influence involving the Qing government, revolutionary parties, and other political forces, showing in detail the historical "interactive" influences between revolution and reform in the late Qing period.